

# 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 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

徐 征<sup>1</sup>, 齐明珠<sup>2</sup>

(1.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信息技术部, 北京 100035;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6)

**摘要:** 本文宗旨是如何建立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正向的代际关系并增强代际间的相互理解。讨论了影响代际关系的因素。家庭趋势的变动对老年人照料提出了挑战。这些发现使未来老年父母一代的前景堪忧, 例如他们经历了更高的离婚率, 因此可能会对来自公共和社会保险项目的支持产生更多需求。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亲密感情和冲突的并存使代际关系变得很复杂。本文最后探讨了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

**关键词:** 代际关系; 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 影响因素; 改善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3)03-0055-06

## Factor Influenc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Build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XU Zheng<sup>1</sup>, QI Ming-zhu<sup>2</sup>

(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China Life, Beijing 100035;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ublication is to foster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elderly parents and grea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generations. First, Factors influencing relationships are discussed. Family trends foster eldercare challenges. The findings raise concerns about future generations of elderly parents, who will have experienced higher rates of divorce, and therefore are likely to place greater demands on public and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for assistance. Simultaneous feelings of closeness and conflict may complicate the relationship. The paper ends with steps both generations can take to enhance their relationship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dult children and elderly parents; factors; enhancement

通常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代际”一词: 一是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考察不同代人, 也即不同的人口(出生)队列; 二是家庭内部的代际, 即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代际”位置; 三是每个人在一生中所经历的不同年龄段, 如青年、中年和老年。

从生命进程的角度来考察代际关系, 正如

莫瑞卡(Morioka)<sup>[1]</sup>指出的, 年老的父母和他们的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三个连续阶段来改变的: 父母与转向成人期的子女, 父母与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早期阶段的已婚子女, 以及处于晚年阶段的父母。在前两个阶段, 父母在很多方面援助他们的子女。在第三个阶段, 援助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第二和第三

收稿日期: 2003-01-15

作者简介: 徐征(1969-), 男, 四川人,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信息技术部高级工程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这里的社会福利是经济学意义上的。

阶段中，代际关系依父母和子女的居住安排不同，代际关系变化而异。居住方式的安排体现了在第三阶段对老年人的照顾程度，反过来也决定了代际关系的强度。

此文中，我们侧重研究家庭内部老年人及其成年子女之间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社会和家庭的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与晚年生活息息相关。令人深感忧虑的是，所有这些变化似乎都预示着社会和家庭对老人支持会越来越少。我们将逐一考察这些变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 一、社会福利状况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今天，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子女和代际间的亲属仍然是老年人获得资源的主要渠道。在考察代际关系时，代际间资源的流向，老年人从他们的成年子女那里得到的帮助种类和强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成熟的社会福利系统对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和他们的成年子女之间货币、服务等交换水平和模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各个国家在老龄问题研究中，从多方面和多角度做出了回答。

#### 1. 负向影响

最开始由阿伯瑞姆和史密斯 (Abrams and Schmitz)<sup>[2]</sup>提出来的称为“挤出去”的假设认为成熟的社会福利系统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是负向的，因为责任由家庭转向了公共系统。社会福利将家庭责任“推向一边”，由此弱化了代际之间的休戚相关性。优越的社会安全保障会降低家庭向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服务的意愿，也就是说，慷慨的社会福利系统削弱了代际之间的亲密关系。

#### 2. 正向影响

相反，世界银行在1994年提出的“挤进来”假说认为，老年人拥有了在经济上能够保障最低基本生活需求以外的资源越多，与子女间的给予或接受的互惠程度就越大。库尼曼德和瑞恩 (Kunemund and Rein)<sup>[3]</sup>指出，国家的供给慷慨会加深亲情并增大代际之间亲近的机会。虽然在社会的宏观层面上福利花费和家庭和睦之间的关系是负向的，但是在家庭内部的微观层面上对代际间的亲情和互爱的影响却是正向的。

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应该由谁负责提供照顾也可以形成代际互换的模式。库瑞斯 (Qureshi)<sup>[4]</sup>指出，西方模式中为老年人提供照顾者的先后顺序如下：伴侣，然后是女儿，儿媳妇，儿子，女婿，其他亲属，最后是非亲属。在亚洲文化中，顺序又有所不同。尽管老年父母与子女同住是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然而即使在中国和日本，合住的比例也在下降。库尼曼德和瑞恩提出，在有关代际关系的个人决策中，责任的概念没有互惠的概念稳定、重要。

在经济学中，关于给予的动机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利他主义和交换理论。贝克 (Becker)<sup>[5]</sup>指出，代际间的交换是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也就是说，在父母最“需要”的时候，子女的资源会流向父母，反之亦然。这里，“需要”被定义为由于健康和经济状况不好而产生的需要。而交换理论指出给予是为了获得回报，如父母为子女提供服务（照顾孙子女等），反过来，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或已与父母同住作为回报。而且，子女帮助老年父母，会增大孙子女一代效仿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拷特利考夫和莫瑞斯 (Kotlikoff and Morris)<sup>[6]</sup>甚至扩大了交换理论的逻辑范畴，使之更有煽动性：父母的资源流向子女并不是恩惠或责任，而是简单的贿赂！此外，还有一种“热光”假说<sup>[7]</sup>，认为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是因为他们要获得给予的满足感，无他。

利他主义和交换之间的区别在“挤出去”的讨论中至关重要。如果纯粹的利他主义存在的话，福利系统提供的支持会将子女提供的支持“挤出去”，因为谁来提供照顾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资源的可获得性。换言之，如果利他主义成立，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更可能与老年人及他们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则从福利系统中获得足够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不太可能将子女视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如果交换动机起作用的话，则存在正反两种情况。良好的社会福利也许会削弱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却可能加大子女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大部分研究表明，在代际关系中，纯粹的利他主义并不占主要地位，而

以交换动机为主。所以，当考察社会福利和代际之间关系时，要考虑老年人得到的不同类型的支持。如果“热光”假说成立，父母对子女的依靠与父母和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无关。下面我们将从更微观的层面上探讨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 二、离婚会削弱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关系

代际关系在社会层面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重点探讨中年人及更年长者婚姻形式的变化对代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是离婚或同居对代际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离婚将降低老年父母获得其成年子女非正规照顾的可能性，并减弱代际间经济纽带的强度，对父亲而言更是如此。霍普金斯大学健康照顾政策研究室的斯考（Schone）博士和医学院的派京（Pezzin）博士最新的研究表明，高离婚率导致以紧密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核心家庭正被新的家庭模式所取代。他们重点从四个方面考察离婚或丧偶的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老年父母是否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援助状况；成年子女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提供的照顾情况；父母利用正规（付费）服务状况。他们对关于家庭结构变化对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关系影响的研究表明，离婚可能会削弱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可能减少。离婚事件甚至在发生很久之后，即父母进入老年后，依然对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削弱代际间的经济联系，并减少子女对父母提供的非正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或身体较差的老年父母不太可能指望得到他们子女的经济支持或生活照料。研究发现，与丧偶的老年父母相比，离婚的老年父母，尤其是父亲较少得到成年子女提供的非正规照顾。离婚的父亲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在晚年得到的子女照顾非常少。

其次，继父母更有可能利用正规服务。离婚会产生继父母和继子女，那么会对代际关系有何影响呢？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没有与亲子女那么密切。继父母对继子女的经济支持要比

对亲子女少，同时继父母利用付费的正规服务的可能性更大。老年父母对亲子女的个人状况如经济和婚姻状况更关注，而对继子女则不然。

再次，再婚会更加削弱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再婚的父母更少得到子女的非正规照顾，而增加付费的正规照顾小时数；同时再婚的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也比只结一次婚的父母少<sup>①</sup>。

上述研究发现，离婚使未来一代的老年父母的养老前景堪忧，他们可能会对公共社会保险项目产生更多需求。家庭变革趋势对照顾老年人提出了新的挑战。

## 三、亲属关系的新形式会增加老年父母可获得的资源

家庭的变化必然导致传统的亲属关系形式被新的亲属关系形式所取代。正如瑞利 M. W 和 J. W 瑞利（Riley M. W and J. W Riley）<sup>[8]</sup>提出的，新的亲属关系较少体现责任关系，而更多的体现为当老年人有需求时可供选择的潜在关系，通常被称为亲属关系的“潜在的矩阵形式”，这种形式不再拘泥于代和年龄。任何年龄的人，同代人或跨越代际，都将选择彼此支持、关爱和信赖。同居、代亲属、新的生物社会关系（如一个人拥有两位母亲的可能性，一位母亲贡献卵子，另一位母亲实施生育过程）都预示着这种潜在的矩阵结构将会来到。在这样的矩阵结构中，很多关系都保持“潜在性”。然而，这些关系对老年人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安全网，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从这张网中选择。

过去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些事情的负面影响，担心未来父母和子孙后代的关系。但是瑞利 M. W 和 J. W 瑞利看到了这些变化的潜在的正面影响，这些变化转换了亲属关系的本质：“1. 财产和物质资源不再是维护代际关系的主要因素，而是寻求正规支持或从政府和公共机构中得到支持，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独

<sup>①</sup> “Parental Marital Disrup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 Analysis of Lone Elderl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published in the August issue of Demography. Vol. 36 (3). p. 287 - 297.

立性。现在应该更强调情感联系、友情、亲情和关爱。2. 如今的老年人相当健康，在很大程度上能实现需求的自我满足。3. 现代家庭成员的年龄差异不断加大，这种年龄差异降低了传统上代际之间年龄差导致的潜在限制和冲突。4. 很多可供选择的关系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父母和子孙间的简单关系的限制，而是提供了亲属关系的广泛选择。”当然这些说法有待商榷。

#### 四、性别对代际交换的影响

农村人口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而且农村老年人缺少社会福利，属于脆弱的人群。所以，农村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代际交换不容忽视。虽然父母和子女之间会互有交换，但是总体上看，在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交换中，是从成年子女流向老年父母，即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比父母为成年子女提供的更多。不能忽略的是，代际交换的内容和频度与老年父母的性别及成年子女的性别有关。通常情况是，父母为儿子提供的比为女儿提供的多；儿子比女儿为父母做的多；母亲为成年子女付出的比父亲多；成年子女为母亲提供的比为父亲提供的多。影响成年子女流向父母的资源多寡的因素包括：（1）父母和子女居住地的距离；（2）代际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3）子女责任感的强弱。影响父母为子女做事情的因素包括（1）子女的年龄；（2）父母与子女居住地的距离。下面我们将详细考察父母与子女居住地的距离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 五、居住方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父母与子女的距离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院利那松（Lennartsson）教授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结构，地理距离对代际接触的影响做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对55~84岁瑞典老年父母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子女和父母之间有经常性的联系，尤其在调整居住地距离后更为显著。

成年子女与独立居住的父母之间亲密程度关系通常要比与共同居住的父母弱，特别是与独立居住的父亲关系更弱。在孩子成长阶段与父母的分离可能导致代际之间接触减少，并且增大了两代人远距离居住的可能性。居住距离

近将增大父母和女儿之间每周接触的可能性。当考察居住距离较近的父母和子女时，发现女儿比儿子与母亲每周的接触频率要多。这个结论对父亲不成立，表明母亲和女儿的亲密关系是代际关系中最活跃的一种，女儿和母亲之间频繁的电话联系也表明这一点。用每周的电话联系弥补较少的面对面接触对母亲来说比父亲更普遍，对女儿比对儿子更普遍。

#### 六、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利那松（Lennartsson）教授还考察了子女所处的社会经济阶层及其流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他考察了537位77岁到98岁之间的瑞典老年人，研究其社会阶层及其流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同时考虑了老年父母及其子女的社会阶层。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社会经济阶层身份，非体力工作者与父母的联系较少。然而，当控制了居住距离变量后发现，只有稳定的非体力劳动者（原本就属非体力劳动者阶层）与父母社会联系明显较少。这表明社会经济阶层变动对持续的家庭联系没有太多影响，即发生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子女并没有减少与他们的家庭联系；但是原本的社会经济阶层则影响他们与父母联系的紧密程度。

#### 七、代际关系的复杂性—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冲突与亲密的并存

在父母一方健康状况下降时，而另一方死亡或经济压力意味着使走向年迈的父（母）亲需要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情感支持，例如帮助做饭，清扫房间，提供交通或经济资助。当今的很多成年子女需要增加与年老的父母接触，这可能改变自己和父母以往的生活定式。

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减轻提供照顾者的负担。互相关爱和支持的成年子女和父母显然对处理因老龄所带来的变化更有准备。而对那些从孩提和青少年时代就与父母有冲突的成年子女而言，可能意味着冲突会持续到父母晚年，早期冲突再度爆发，甚至加深负面的感情。这时，为老年父母提供支持和帮助对成年子女来说就格外困难。对成年子女和年老父母之间代际关系的感情可以回溯很

多年，亲密和冲突的并存可能使代际关系变得很复杂。

### 1. 依恋

依恋是两代人之间持久的血缘亲密情感。孩子和父母之间以往的亲密关系将影响到父母中年甚至晚年后与孩子的关系。一项关于依恋的研究表明，亲密情感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恋能为孩子带来抚慰和安全感，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和牵挂随着时间而变化，整个生命周期的紧密情感，都会影响与父母的关系。与父母感情亲密并且爱父母是依恋和牵挂的最基本表现。当感到会失去父母（如父母病重）或与父母重拾亲密关系时，这种依恋和牵挂就会增强。当子女看到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受到来自疾病的威胁时，子女会努力帮助父母生存下去，并保持情感上的联系。如父母生病时，成年子女会细心不断地督促父母按时服药，看护、照料年迈的父母。

### 2. 如何化解冲突，重拾亲密情感

晓知子女与父母的亲疏程度可以影响代际关系后，我们来讨论如何化解冲突，增强代际间的相互理解。从子女方面，首先自我评估与父母之间代际关系的亲疏程度。例如对与父母的关系满意吗？感到与父母亲近吗？愿意与父母共处吗？与父母在一起多长时间我会感到舒适？有的子女发现只能和父母同处几个小时或是几天，否则就会感到紧张，或爆发冲突。和父母有共同兴趣吗？经常和父母一起谈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未来及敏感话题吗？然后，找出与父母的冲突所在。和父母的冲突程度如何？在什么问题上冲突？这些冲突起始于本人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你对这些冲突负什么责任？虽然改变对方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例如，改善沟通方式，以减少冲突。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然而，试试用新视角来解决问题。把个人感觉、感受、印象和想法写下来，慢慢去实现这些建设性的行动将有助于降低冲突并形成新的代际关系。

当老年父母想化解意见时，可以尝试下列建议解决冲突。带着感情，尽量真诚坦率面对。那些过去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事情可能得到解释或承认。通常，通过这个过程，感情会发

生变化，关系会得到改善。但是，必须是自愿的去分享感受和想法。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今天的对方，这时对对方的感激就会增加，就更容易达成谅解。

### 八、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

我们将分别从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两个角度来考察，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首先来看子女的成熟度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子女的成熟度是影响代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成熟的子女会以成熟的方式与老年父母相处，他们了解父母的个人需要和目标，在接受父母的正面品质的同时也接受父母的缺点和不足。同时，成熟的老年父母也会帮助子女成熟，这意味着父母也要视成年子女为独立的个人，感谢并乐意接受子女的帮助。

在改善代际关系方面，首先承认并尊重父母作为独立的个人。孝顺的成熟子女会改善原有的代际关系，并使新的代际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美国家庭服务协会强调了子女成熟度的特性。并对他们提出：如果你感到你的父母并不接受你为独立的人或是不爱你，赶快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并开始寻找新的途径使父母接受你，爱你并认可你。如果可以的话，请对父母说“对不起”，并且帮助父母很容易地对你说出“对不起”。其次，学会表达和聆听。在你自己的需求和父母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不使自己感到压力过重，难以应付。学会向父母表达你的感受和愿望。让父母了解你的感受、愿望及对未来的忧虑。聆听是支持年老父母的一种方式。这种情感上的支持跟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同样重要。如果身体接触或拥抱对你和父母来说很自然的话，也请试一试。

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帮助父母与社会保持接触，特别是如果你的父母原本很活跃，社会交往很多。通过情感支持激发他们的社会交往，这可能会有助于延长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鼓励他们树立希望、梦想、雄心甚至是新的生活目标。当他们尝试新事情，如旅游、新的职业甚至再婚时，支持他们。当父母身体状况不佳时，为父母提供书籍、杂志，跟父母交谈，使生病的父母感受到来自外面世界的鼓

舞。在可能的时候，鼓励年老的父母自我照顾而不是提供直接服务。如果你认为你的父母想换个环境，帮助他们安排一次旅行，要比直接带他们到某个地方要好。买一双舒适的鞋，鼓励他们每天散步锻炼，培养他们自我帮助的生活方式。

此外，子女还应该学习关于老年的知识，这会有助于理解老年父母的感受。当父母逐渐年老的时候，如果成年子女能够理解父母生活方式的变化，父母对这些变化的感觉，和这些变化对父母意味着什么，成年子女就能更有效地与父母相处，并为父母提供帮助。了解父母到底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以便满足他们的要求。有的时候，成年子女和处于老化过程中的父母对所需服务的理解不同。例如，大部分成年子女认为对父母的个人照料（如洗澡、穿衣）和家里的健康照料（如在家里的医疗健康治疗或家庭护理）是最重要的，而父母可能认为受到保护（提防犯罪行为，每天查看父母的健康和状况）等更为重要。如果子女漠视父母对于所需服务的感受，或是强加给父母认为不重要的服务，那么代际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损害。双方可能都会感到受挫，并恼火，因为对方不认可他们的观点、努力或需要。应尽力去理解不同感受背后的原因，这可能反映出价值观不同，沟通问题，以及长期的冲突后对父母的需求不敏感。通过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可以获知老年人所关注的事情。

个人老化带来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失去——如角色丧失，丧失健康，丧失经济保障，失去配偶和朋友。有的时候，失去可能是多重的，并且快速连续发生，以至在没有适应一种失去时，又要面临另外一种失去。老年父母怎样应对这些情形，也会影响到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例如，如果父母过度抱怨这些“失去”，抱怨很少见到子女时，他们的子女可能会感到淹没在压力之下，并无力补救这种情形。既然无力补救，子女可能宁愿远离父母，而不是听父母的抱怨。结果是，父母可能感到与子女的联系被切断了。由此，在失去名单中又增加了另一种失去，这会使代际关系进一步紧张。

同样，当父母的健康状况下降，需要更多

支持的时候，仍然可以尝试改善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了解子女一代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的成年子女今天面临的问题；当需要帮助的时候，配合成年子女意味着更通融，甚至妥协以避免子女受挫。和子女公开交流，创造分享感受、共同解决问题的和谐氛围；与成年子女分享变老意味着什么；甚至可能帮助成年子女接受他们自己变老的过程。

互相依靠、彼此需要的代际关系营造了和谐的家庭氛围，增强了代际关系。在互相依靠和信赖当中，老年的父母和他们的成年子女都能保持自我独立和尊严，从而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

#### 参考文献：

- [ 1 ] Morioka, K., 1992. 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ir changes as they affect the status of older people in Japan. In Hareven, ch. 11.
- [ 2 ] Abrams, B. A. and M. D. Schmitz, 1984.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governmental transfers on priv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Cross sectional evidence. *National Tax Journal*, 37: 563- 568.
- [ 3 ] Kunemund, Harald and Martin Rein, 1999. There is more to receiving than needing: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of crowding in and crowding out. *Ageing and Society*, 19: 93- 121.
- [ 4 ] Qureshi, H. 1990. A research note on the hierarchy of obligations among informal carers: a response to Finch and Mason. *Ageing and Society*, 10: 455- 458.
- [ 5 ] Becker, G. S. 1974.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6): 1063- 1093.
- [ 6 ] Kotlikoff, L. J. and J. N. Morris, 1989. How much care do the aged receive from their children? A bimodal picture of contact and assistance. In Wise, D. A. (Ed.),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49 - 172.
- [ 7 ] Andreoni, J. 1989. Giving with impure altruism: Applications to charity and Ricardian equival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6): 1447- 1458.
- [ 8 ] Riley M. W. and J. W. Riley Jr., 1992. Generational relations: a future perspective. In Hareven, ch. 12.

致谢：文中的一些原始资料是由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大学子女与家庭发展研究专家 Lou Isbell 和俄勒冈州立大学老人医学专家 Vicki Schmall 准备，并由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大学家庭经济学院公布的。

[ 责任编辑 王树新 ]